

卷 首 语

在中外历史上,有多少战绩辉煌、事业恢宏的天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而被称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子,不仅没有被忘却,反而更加举世瞩目,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崇敬。

《孙子兵法》于唐代中叶传入日本。日本研究孙子学说比之欧美要早得多,广泛得多,深入得多。日本将《孙子兵法》尊称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最深,它在历史上成为日本军事思想的主体结构。日本历代将领无不奉其为主臬。从16世纪后的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将领,到日俄战争时的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军将领无不推崇孙子,他们战前总是随身携带一本《孙子兵法》,作为指导作战的指南。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的影响,超过古今各国任何一位伟人。如今在日军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发现和感觉到孙子的教诲与影响。

大约在18世纪《孙子兵法》传入西方。1772年出版了第一个法译本,随后,俄、英、德、意、捷、越、希伯来等十几个文种的版本先后问世。迄今两个多世纪中,逐渐引起西方军事家和战略理论家的极大关注。《孙子兵法》是拿破仑最爱读的一本书。他在重大战役前常常挑灯夜读,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德国威廉二世皇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读到了《孙子兵法·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两句话,感慨万分,叹息可惜20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早在1888年俄军总参谋部,即开始撰文介绍《孙子兵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根据伏罗希洛夫学院的建议,将《孙子兵法》译成俄文,列为军事学术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对《孙子兵法》深入、广泛的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核武器、导弹、喷气式作战飞机等新式武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作战形式和规则,西方传统的军事战略理论,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惟独《孙子兵法》的军事哲理、

博大深邃的内涵,依然熠熠生辉。西方的许多军事战略理论家纷纷转向《孙子兵法》,以求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孙子为代表的“以谋取胜”的东方理论与“以力取胜”的西方传统军事理论的较量。较量的结果,前者远胜后者一筹。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离任后偶然看到了《孙子兵法》,其中“兵贵胜,不贵久”的原则,对他启迪甚深。他由强硬的主战派变成主和派,到处宣传孙子的“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忠告,力主美军尽早从越撤军。

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新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把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运用于制定美国现行的国家战略、政治战略、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上。他1988年写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即是运用孙子这一战略思想的产物,至少是受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运筹帷幄》中,援引孙子“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的思想,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分析苏、美全球力量布势中的“要害国家”,为美对苏战略提供理论根据。美国的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指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年前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联合国裁军署的林国炯博士,运用孙子“情报、均衡、辩证”等观点,解决裁军中的一些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美国的福斯特和日本的三好修,根据核武器时代的特点,提出了“孙子的核战略”的概念,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韩国汉城大学教授李大功,运用孙子“伐谋、伐交”的思想,来论证当前南北方的谈判战略,为韩国的现行战略提供理论依据。除上面提到的人士之外,像蒙哥马利、布莱德雷等著名战略家,都根据孙子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地理战略理论。

近一二十年,西方主要国家研究《孙子兵法》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在美国的国防大学、西点军校、海空军指挥学院和英国的皇家指挥学

院,都把《孙子兵法》列为战略学和军事理论的第一本必读书。连西方一些著名民间大学,凡攻读国际政治学者,也都少不了要读《孙子兵法》。自80年代起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将《孙子兵法》编进游击战教材。1984年美国国防大学在所编教材《军事战略艺术与实践》中,把《孙子兵法·计篇》写入必读文献部分。美军把孙子的某些论点写进他们的《作战纲要》。1989年,美海军陆战队司令格雷上将发布训令,将《孙子兵法》列为陆战队全体军官1990年理论必读书之首,并指出“孙子的作战思想在今天仍如2500年前一样适用,是当今实施运动战的基础。”

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十分推崇孙子。他在历次政治选举中,都随身带着《孙子兵法》。他上台之后,应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1991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后,《洛杉矶时报》记者报道,在布什的案头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另一本是《恺撒传》。被派到海湾地区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背包里普遍装有《孙子兵法》的英文本和解释《孙子兵法》的磁带。

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持枪的士兵,人人爱读孙子之书,喜钻孙子谋略。不少社会名流、政治家力主将《孙子兵法》列为世界兵书。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曾建议将《孙子兵法》作为世界上所有军事学府的教材。日本防卫大学宇佐见哲说:“在战争频繁的时代,往往只带着实战的观点来理解《孙子兵法》,目的是打赢战争,结束战争。在和平时期,往往是从政治和权谋的角度理解《孙子兵法》,目的是维持和平局面。”该大学的平间洋一教授在他的论文中也强调指出:“《孙子兵法》应当显示更大的重要性,成为21世纪的兵法。”英国著名作家克拉维尔称,《孙子兵法》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罕世之作。1983年,他为《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写了推崇备至的前言。他在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我们近代的军政领导人研究过这部天才的著作,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有可能避免。可以肯定地说,至少两次世界大战不会打得那样残酷,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不至于被那些称为将军的魔鬼愚弄,在战火中无谓地丧生。”“我希望能把这部书列为全体官兵、一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以及政府和大学里的人的必读之作。因为《孙子兵法》的要旨是:战争的目的是和平。我坚信,孙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保护,使我们的子孙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富裕、成功。”在孙子的家乡山

东省惠民县举行孙子塑像落成典礼暨《孙子兵法》电视艺术片开机仪式之际,他寄来一封贺信并附了一张 500 美元的支票。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欣悉有关尊敬的兵圣的消息,我禁不住要向你们表达我的惊叹。我确信,你们已经注意到了孙子的智慧业已并正在取得伟大的成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到山东惠民县访问,要在孙子塑像前跪拜叩头。”他解释说:“所付的 500 美元微不足道,聊供买一两株牡丹。”因为他想在孙子塑像周围栽几簇深红色的牡丹。他说:“深红色表示好运气。贵国的木本牡丹生长挺拔,象征孙子的高大,茁壮坚实象征着他的强大有力,芬芳沁人会激起人们对他的追忆,永志不忘。”

在当今世界,孙子不仅被军界、政界尊为伟人,也受到经济界特别的推崇。近 20 年来,西方许多经济理论家认为,经济争夺和商业竞争更趋近军事斗争,在战略战术的制定、情报搜集、战区选择、攻防转换、作战时机的选择等方面,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为此,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人,转向军事理论研究,以便寻找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在众多的军事著作中,《孙子兵法》受到特殊的重视。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将《孙子兵法》列为未来的经理人员必读书,并要求背诵其中的部分章节。美国有两家大的商业咨询公司,专门研究如何将孙子为代表的战争艺术应用到市场开发和产品竞争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很受美国一些大公司的青睐。在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其中一家公司的代表麦克尔森先生介绍了这种战略,题目就是《孙子与商业战略》。美国国际科技应用公司近年专门制定了“孙子科技发展战略”,受到了美国国防部、能源部、总统科技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认为在同西欧、日本等的科技竞争中“很有参考价值”。一位叫汉德森的美国人依据《孙子兵法》写了一本名为《如何打赢争夺市场的战争》的书,非常畅销,一版再版,被称为“商业领袖的手册”。美国著名企业家杰拉德尔·麦克斯,在一次《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说,他把《孙子兵法》应用于他经营的一桩生意中,开始,他估计只能赚 200 万美元,由于他运用了孙子的“出奇制胜”策略,结果赚了 1 亿多美元。

西方大公司、大企业如此热衷于研究、应用《孙子兵法》,其目的既是为了制定更有效的竞争发展战略,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以日本为首的东方竞争者的战略、策略,找到应付的办法,以便改变在经济争夺和商业竞争中的被动地位。

日本对西方大公司的这种意图一清二楚。日本经济界在对《孙子兵法》的研读、应用上,远胜西方的竞争伙伴。他们把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广泛应用于企业之间的竞争、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应用于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上,也特别注意应用到当前对美国的贸易战上。在当今的日本经济界,《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非常普遍,专业研究人员有数千人,业余爱好者十万之众。研究深入到各个方面,运用到各个角落。日本的一家大公司每月轮训一次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分析、研究如何应用《孙子兵法》管理企业、发展企业。日本的大桥武夫曾写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公司采用书中的理论后,效益大增。古部都美根据孙子论将的观点,写了一本《怎样当企业领导》的书,把“智、信、仁、勇、严”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必备的条件,受到企业界的普遍重视。许多日本人应用《孙子兵法》的原则和哲理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写出了《孙子与人际关系》、《孙子与高考战略》等普及性读物,深受读者欢迎。连日本的棒球队、足球队在比赛中,也普遍采用孙子的竞争原则,许多运动员对《孙子兵法》中的警句,可以脱口而出。

西方军界、政界、经济界竞相研究《孙子兵法》,互相启发,互相激励,研究成果接连不断,研究人才层出不穷。他们以孙子思想体系及其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为主题,进行高层次的探讨,深层次的挖掘,研究应用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商业、企业、体育、医学等领域。特别在运用孙子的思想分析当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预测多极时代国际局势发展趋向,观察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制定当代国际战略,对付国际间激烈的经济竞争等等世界瞩目的重大现实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纵观战场、商场,浏览印业书市,孙子之书,遍及五洲大地,显现四海厅堂斋宅。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共有 30 种语言文字的《孙子兵法》版本。其中,中国就有 6 种语文,汉文 400 余种版本、蒙古文 6 种版本、满文 4 种版本,西夏文、藏文、维吾尔文各 1 种版本。《孙子兵法》的汉文版本最多,其次是日文版本。英文有 10 种版本,法文有 6 种版本,俄文有 5 种版本,朝鲜文有 5 种版本,意大利文有 3 种版本,德文有 2 种版本。另外还有捷克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希腊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土耳其文、斯瓦希里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印尼文、马来文、越南文、缅甸文、泰文等语言的版本。

孙子之书被世人广泛传播应用,孙子之名赫然位于西方所推崇的亚历山大、恺撒、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克劳塞维茨之前,这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特殊贡献。

本卷由国外学者服部千春(日本)、尼凯(法国)、高利科夫斯基(波兰)、阿竹仙之助(日本)、约翰斯顿(美国)诸君提供资料,王伟、苏末、李芳华、邱曦翻译,华西、尚夏综合整理而成。

华 西

2002年5月3日于

三亚望海楼

目 录

卷首语	1
壹 《孙子兵法》在日本	1
貳 《孙子兵法》在亚洲其他国家	42
叁 《孙子兵法》在法国	52
肆 《孙子兵法》在英国	62
伍 《孙子兵法》在德国	65
陆 《孙子兵法》在西欧其他国家	69
柒 《孙子兵法》在俄国/苏联	86
捌 《孙子兵法》在东欧其他国家	93
玖 《孙子兵法》在美国	100
拾 《孙子兵法》在美洲其他国家	120
拾壹 《孙子兵法》在大洋洲	125

壹 《孙子兵法》在日本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仅从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即可见一斑。据日本史书的记载：“（应庆天皇十五年，公元 285 年）秋八月阿直岐亦能读（中国）经典……天皇间阿直岐曰：‘是否有胜过汝之博士？’对曰：‘有名王仁者，极为优秀。’（应神）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即以王仁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令太子隋王仁学习各种经典书籍。”（李寅生《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社 2001 年版）这只是有记载的正式的使用汉字，至于汉字最初传入日本列岛的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至少在“公元前 4 至前 3 世纪，汉字传入朝鲜和日本列岛（同上）。随着汉字的传入，汉文典籍也陆续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事记》（成书于 712 年）卷中应神天皇条记载：“天皇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迺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和迺吉师是文首等的祖先。”在《日本书纪》（成书于 720 年）也有类似的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 286 年）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这些记载无疑表示公元 3 世纪的时候，中国文献典籍已经传入日本列岛了（王勇、陆坚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一 《孙子兵法》东传诸说

那么，作为中国重要典籍的《孙子兵法》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呢？日本著名《孙子》研究家佐藤坚司博士在其所著《孙子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即由百济人传入和吉备真备引进二说。佐藤在该书《〈孙子〉研究的初始阶段》一节中写道：

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推测当于天智天皇二年(公元663年)以前。《日本书纪》第二十七卷,在公元663年九月记事中记载:百济(朝鲜古国——译者)兵法家‘达率(意为司令——译者)木素贵子、谷那晋首、忆礼福留……始向日本’。另据养老四年(公元720年)记事载:‘秋八月,遣达率答怛春初筑长门国。遣达率忆礼福留、达率四比福夫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由此可知百济兵法家在日本进行了筑城活动。因此正如养老十年春记事所载,达率谷那晋首、达率木素贵子、达率忆礼福留、达率答怛春初因‘娴兵法’而被授予大山下之位。这四位百济人精通中国兵法,可以推断是他们把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而且这部中国兵法可能就是孙子兵法,这一点可根据下面的记载判断出来。

“据《日本书纪》第三卷记载,神武天皇之兄征战矶城的时候,椎根津彦的计策中有‘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语句,这与《孙子·始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是相同的,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事实呢?我认为,上述记载并不意味着神武天皇采用了孙子兵法,而是《日本书纪》的编撰者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人的头脑里有此思想,便使用了孙子的语言‘出其不意’表达了神武天皇的兵法。再做进一步推想,由于《日本书纪》的成书年代(公元720年)仅在记载四位百济兵法家活动时间(公元663年)的57年后,因此可以认为‘出其不意’是由百济人传授的,进而可以认为这些百济人把《孙子》引进日本。至少可以设想孙子兵法最初是由他们传进来的。”

接着他又写道:“然而,在日本人中最初把《孙子》引进来的是吉备真备(公元693—775年)。吉备于养老元年(公元717年)至天平六年(公元734年)赴唐(玄宗年间)留学18年,兼修文武两学,所以他回国以后充分发挥了其在唐朝学到的兵法知识。在《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十一月丙申条有这样的记载:‘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貳吉备朝臣真备,令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该记载证明了吉备将《孙子》带回日本,同时也证明了他对孙子兵法是何等娴熟。”(转引自高殿芳等译《孙子研究在日本》)

另外,据美国《孙子》研究专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将军的研究,公元516年,中国一位熟悉兵书的学者曾到日本(525),日本继体天皇在任命其子粗鹿火为兵马统帅时曾说过“夫将者,民之命与国之存亡所系也。”这句话显然有些受了《孙子兵法·作战篇》中“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的影响。这样,最晚至6世纪初,《孙子兵法》已传入日本。

以上三种说法,我们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而且时间还要早一些,其理由有五:

其一,根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527年日本筑紫(今九州)的地方官国造磐井发动兵变。当时的继体天皇(450—531)在其颁发的讨伐叛军的诏令中,曾写有这样的话:“良将之军也,施恩推惠,危己治人,攻如河决,战如风发。”“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其思想和用语多与《孙子·作战篇》“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暗合(转引自潘俊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载《军事历史》1989年第5期)。

其二,可以从圣德太子(573—622)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得到印证。据《日本书纪》:“(推古十二年,公元604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推古女皇于592年即位,翌年立圣德太子为摄政。604年圣德太子用汉文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十七条政治道德,即史称“《宪法十七条》”,也有称《十七条宪法》者。对《宪法十七条》的遣词用句,日中学者均认为多出典汉籍诸子百家。其中几处用语与《孙子兵法》极其相像。例如,第十条“是非之理,诈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之无端”;第十一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第十五条“上下和谐,其亦是情矣”。上述以次与《孙子兵法》中《势篇》“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势篇》“赏罚孰明,吾以知胜负矣”;《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诸句极相似乃尔。尽管有学者认为有的句子可能引自《史记》等典籍,但也不能排除圣德太子研读《孙子兵法》的可能性。虽然在那时《孙子》作为禁秘书只有皇室人员能够接触,但圣德太子作为摄政的身份是完全有可能看到的,只是目前还缺乏直接的文献来证明。

其三,日本寺尾善雄(1923—)在《兵法与武艺》(《孙子·韩非》,日本旺文社1985年版)这篇介绍中国兵法武艺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兵法传入日本,据传说是仲哀天皇(2世纪末)为征伐熊袭驻在九州时,从

中国渡海而来的一个叫陶履公的人,向天皇传授黄帝的‘八阵’兵法。天皇将其教给皇后(神功皇后),天皇死后,皇后用它讨伐新罗(朝鲜古国——编者)得胜。其子应神天皇从其母后处学习兵法,临终前担心‘此兵法若留存于世,必有滥用之而起无用之兵乱者’,遂焚兵书,饮其灰,曰‘吾死而成军神’,气绝身亡。供奉该天皇的军神八幡宫,所谓八幡状是因为八阵有八根幡而得名的。”自然这是一种传说,不能作为史实,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历史轨迹。寺尾接着又写道:“根据记载,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天皇命亲王以下诸臣学习兵法,似为日本最早的兵法学习,其后的持统天皇七年(693),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兵法中有《孙子兵法》,但此距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的时间已有几十年了,中日文化交流已初具规模,很难说不是这些留学生(僧),把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兵书带回国。

其四,据北京大学严绍璁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撰写于养老四年(720)的《日本书纪》一书,“不仅全用汉文写作而且大量引用中国文献典籍,如该书卷一开宗明义表达天地形成的观念,……这一段作为开场白的文字,则是直接从《淮南子·天文训》推演而成的。此外,《日本书纪》中还引用了诸如《史记》、《汉书》、《南史》、《北史》、《水经注》、《新序》、《述异记》、《尉繚子》、《吴子》等书。”(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孙子兵法》,但早于《尉繚子》、《吴子》在战国时期就“藏孙、吴之书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的《孙子兵法》,想必来华日人也会千方百计弄到的,只不过当时作为禁秘书流传不广而已。

其五,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时间看,将吉备真备(693—775)称为《孙子》“携入日本第一人”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日本自630年至894年约260年间,共任命过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吉备真备来华时间第一次是717年,在中国生活18年;第二次是752年,翌年回国。在吉备真备入唐之前已有8次遣唐使到过中国,时间跨度约一个世纪。而作为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以学习文化、购求书籍为使命。因此,称遣唐使为‘文化使节团’当名副其实”(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我国《旧唐书·东夷传》也记载,每次遣唐使归国,都是“所得锡赆,尽市文籍,泛海而还”。这些都说明历届遣唐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求中国典籍。因此,很难想像在吉

备真备入唐前的 100 多年间,8 次遣唐使们会将《孙子兵法》这样一部重要的兵书漏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子兵法》很可能在四五世纪,最迟不晚于 6 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列岛了,吉备真备并非将《孙子兵法》引进日本的第一人,而是现有文字记载的首次在日本传授《孙子兵法》的人。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

二 日本各时期《孙子》研究概况

日本是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加以消化融合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民族。如同儒家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形成日本独特文化一样,中国的兵家学说,特别是《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经经绳绳,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成为历代兵家武士的灵魂。如果将这个过程的分期,根据各时代对《孙子兵法》研究特点的分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奈良时代至室町时代(710—1603)^①的“秘藏家传时期”;江户时代(1603—1868)的“刊印注释时期”;明治时代(1868—当代)以后的“融合拓展时期”。现分述如下。

(一) 秘藏家传时期(710—1603)的《孙子》研究

《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在很长时间里是作为朝廷的秘籍只有皇室及亲王等少数上层人士可能接触。同时,由中土传来的书籍数量有限,自然需要抄写本。加之汉字不便识别,必须对原写本加注训点。因此,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多以手抄口授为其基本特征。经过长期历世的父子师承传授,又形成了专事传抄、训点和授读的“明经世家”,至镰仓、室町代而大盛,尤以源原家久擅盛名。清原宣贤(1475—1550),自号环翠轩,是天武天皇之子舍人亲王的 23 代孙,室町时代著名汉学家,两朝待讲,常于宫中授读。已知他于天文五年(1536)所撰《孙子抄》,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抄本,或称训读本,现以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而予以特别的保护(刘起轩《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商务印

^① 日本各时代年限,依据王勇著《日本文化》一书。

书馆 1997 年版),从中我们可窥见《孙子》在室町时代流布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从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寻觅日本早期《孙子兵法》的有关线索。此书目是贞观十七年(875)皇室用以藏书的冷然院毁于火灾,历代藏书化为灰烬。藤原佐世奉宇多天皇敕命,全力收罗残存的汉籍,于宽平三年(891)编成的。该书目共收汉籍 16790 卷,除大量儒书、佛经外,还包括数量可观的诸子典籍,其中在“兵家”条下,共著录兵书 242 卷(实际收录 221 卷),《孙子》书就有六种:

《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

《孙子兵法书》一卷,巨诩撰;

《孙子兵书》三卷,魏武解;

《孙子兵法》一卷,魏祖略解;

《孙子兵法八阵图》二卷;

《续孙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

这些兵书,均当以中国带回的典籍,对照《隋书·经籍志》所载,其第二种当为贾诩《钞孙子兵法》一卷;其第四种即《孙子略解》,或称《魏武帝注孙子》,其他均如其名。这个书目,晚于《隋书·经籍志》200 余年,早于《旧唐书·经籍志》50 余年,《新唐书·艺文志》150 余年。不仅综合性地描绘出了自上古时代以来中国典籍在日本流布的一般概况,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孙子兵法》流布的信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这个时期中日两国史书记载的几件事,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情况。

其一,《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760)十一月条载:“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貳吉备真备,令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这是迄今日本史书上第一次提到《孙子兵法》,也是首次提到日本人传习《孙子兵法》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说明《孙子兵法》在当时已有广泛的影响,以至皇室指派留学中国 18 年、深谙文武之道的吉备真备设塾授讲。同时,还记录了吉备真备在天平宝字八年(764)奉命讨伐叛将惠美押胜。在作战中,吉备真备运用孙子《九地篇》阐述的“兵闻拙速”和“兵之情主速”,以及“以迂为直”等用兵原则,结果只用八天时间就战胜了叛军,将惠美押胜“斩于湖畔”(石母田正、松岛荣一:《日本史概说》)。彻底平息叛乱,大获成功,开创了日本军事史上成功运用《孙子兵法》指挥作战取得胜利

的先河。

其二,《续日本纪》第二十七卷记载,桓武天皇在延历八年(789)五月,在责问征东大使纪古佐美征讨虾夷迟滞(在衣川迟滞30余天)的敕书中有这样的语句:“未审缘何事故致此流连,居而不进未见其理。夫兵贵拙速,未闻巧迟。”这显然衍用了《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之意。同时,也可看出桓武天皇对《孙子兵法》娴熟于心,运用之自如。

其三,从《斗战经》一书反映出来的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情况。《斗战经》是日本早期的一总兵书,著作年代约在平安时代后期(894—1185)。此书佐藤坚司认为,“在文的方面吸取了孔孟老庄的思想,在武的方面吸取了孙吴的学说,同时表现了强烈的日本特点”(《孙子研究在日本》)。其书曲解《孙子兵法》,认为“只有刚毅、真锐是日本的武教;与此相反,汉文(指《孙子》)只不过是提倡诡譎而已”,甚或又提出“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阐扬其“汉文有诡譎,倭教说真锐”。对此,佐藤坚司指出:“《斗战经》的作者不与孙子的小心谨慎和全胜主义共鸣,而将其指责为缺乏刚毅的‘惧’字,因此曲解《孙子》是施用诡道者”,“他未能理解《孙子》所具有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其深邃奥义。未能理解作为常经的五事、七计的本义,只把《孙子》全书曲解为权变和诡道,这是轻率之至”。批评“《斗战经》的作者从真锐或者刚毅的立场出发,简单的否定孙子的诡道和奇正的用法,这是根本没有理解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并对实践兵法茫然无知”(同上)。这部日本首次专门研究《孙子兵法》等中国兵书的著作,虽然曲解了《孙子兵法》,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已深入到对具体字词的领会和思想的探讨,并初步形成日本孙子兵学的“日本特点”。

其四,康平五年(1062),著名武将源义家(1039—1106)在厨川(今岩手县内)之役中,运用《孙子》“围师遗阙”之法,大破敌军。在1084年至1087年“后三年之战”的陆奥战役中,一次行军中发现雁鸟乱飞的现象,源义家从《孙子兵法》中“鸟起者,伏也”的经文中得到启发,遂判断敌人有伏兵,果断修改原定行军路线,绕过敌人的埋伏,免遭伏击,化险为夷,并夺得了战争的胜利,成为《孙子兵法》东传日本的一段佳话。

其五,弘和元年(1381)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在致中国皇帝朱元璋的

一封信中,也提到了《孙子兵法》,信称: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水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明史·日本传》)信中所称“孙吴韬略”,佐藤坚司认为当然指《孙子》、《吴子》、《六韬》、《三略》(《孙子研究在日本》)。从这封信中,既显示了怀良亲王对孙吴兵略的精深研究,行文组句信手拈来,又可看出此时中国兵书几乎尽入于日本。

其六,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8)是群雄纷争、名将辈出的时代,出现了诸如毛利元就、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他们无不精通兵法,运用孙子兵法得心应手,打了很多胜仗,现仅举二例:

武田信玄(1521—1573)是战国时代风云一时的人物,因与上杉谦信长期作战而闻名,尤其于天文十年(1541)信玄成为武田家族首领之后,在与谦信争夺关东霸权时,威名大振,对织田信长形成一种威胁。信玄最后与信长作战时负重伤而亡。武田信玄从其祖辈传下来的家传兵法(武田家以奉《孙子》为家法),亲率“武田军”南征北战,攻城掠地,争雄一方。他深通《孙子》十三篇,特别钟爱《军争篇》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四句话,并绣在大军的突击旗上,以此鼓舞士气,振奋军威,体现了武田信玄“常变一体,动静一元”的战略思想,如今这面旗帜仍珍藏在日本盐山市云峰寺中。武田信玄不但敬仰《孙子兵法》,而且由他本人撰写的著名兵书《甲阳军鉴》在慎战、气胜以及不战而胜等方面与《孙子兵法》亦有共同之处,故有“日本的孙子”的美誉。

丰臣秀吉(1537—1598),是结束战国时代、统一日本的一代名将。在天正十二年(1584)决定命运的小牧战役中,统帅 12 万大军的丰臣秀吉,面对 1.8 万人但占据局部优势的德川家康军,没有采取强攻硬打之策,而是通过谈判与德川家康和解并使其臣服,避免了打消耗战,保存了双方的实力。尔后又联合起来攻克四国和九州等地,最终统一了全国。丰臣秀吉运用的战略,佐藤坚司研究认为“其精神方面与《孙子·谋攻篇》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战谋’是一脉相承的”(《孙子研究在日本》)。丰臣秀吉对《孙子》的用间思想亦情有独钟,心领神会。每次作战前,他都要派出大批间谍,收集各种情报。他要求派出的间谍人员要不间断地移动,按严格的预定路线活动,并用后一组间谍的报告去核实前一组的报告,以此验证情报的准确性。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在谋划征服九州岛时,要求间谍送回各种详尽的草图和地形图,以及有关收成、粮食供应、运输车辆和各军阀与其部队之间关系等情报,直到对手情况了如指掌后,才投入战斗。

纵观这一时期《孙子兵法》的流布,虽因禁秘书而局限在皇室上层的小范围内(后期已有扩散的倾向),但没有阻碍在实际军事斗争中的运用,而且为江户时代大规模的注释训解《孙子》奠定了基础。

(二) 刊印注释时期(1603—1868)的《孙子》研究

这一时期即指江户时代。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1542—1616)受封“征夷大将军”,于天正十八年(1590)进入江户(今东京),幕府体制确立,史称江户时代。在此后的 200 多年间,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空前繁荣,封建社会达到顶峰。这一时期,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也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高峰期,版刻印刷迭起,注译训解大家辈出。此间研究《孙子》者近百家,刊印《孙子》书达 140 余种,存世逾百种,还有数量可观的写本、抄本现藏于日本各地,可谓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鼎盛时代。

1. 活字印刷《武经七书》,开创刊印兵书先河。德川家康崛起于日本政界文坛,首先他在伏见开办学堂,以闲室和尚元佑(1548—1612)主其事,刻木活字十余万,下赐该学校,并于庆长四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首先复刊了《三略》、《六韬》,四年后印毕。又于庆长十一年

(1606)刊印《七书》(即《武经七书》)二十四卷,即后来有名的“伏见版”。从此结束了日本手抄摹写汉籍兵书的历史,开始了江户时代勃发的汉籍兵书的复刊事业。神田胜久在《孙子俚谚钞》序言中说:“我朝庆长中,东照大神君下命锓梓,普使天下之武生讲读之。”从《武经七书》卷末题跋来看,可知校订人即是闲室和尚元佑其人,此本现中日两国均有收藏。

2. 注释《孙子》的先驱林罗山。活字版《武经七书》的刊印,带动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首先对其进行注解的便是江户大儒林罗山(1583—1657)。林氏为日本朱子学的奠基人,终生仕奉德川幕府,历任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侍讲,参与幕府制定法令、起草外交文书等机要。他当将军的侍讲,又主持幕府的学问所,其间主持标点刊印大量的中国古籍,仅《孙子兵法》就有《七书评判》(1606)、《孙子抄》(1606)、《孙吴摘传》(1620)、《孙子谚解》(1626)和《孙子讲义私考》(1626)多种。其中尤以《孙子谚解》开日本注释《孙子》一代之风,诚如佐藤坚司所言:“要论对《孙子》的研究,那么《孙子谚解》的作者林罗山就是其草创人”,“江户时代的《孙子》研究,是从林罗山的《孙子谚解》开始的”。虽然林氏的注解“仅限于简单的字句注释,并不是主动的研究”(《孙子研究在日本》)。也就是说,尚不是真正意义的《孙子》注释书,但由于其显赫的地位和他在文坛的影响力,对江户时期《孙子》研究的勃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注家蜂起效尤,著述异彩纷呈。继林罗山之后,注解《孙子》遂形成一代风气,群起而效法,且多为各兵家流派的代表人物。摘其要者简述如下:

(1) 北条氏长(1609—1670)是“北条派”的创建人。佐藤坚司认为,日本《孙子》研究至北条氏长“才真正步入正轨”,其“在日本的《孙子》研究者中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孙子研究在日本》)。原因在于北条氏长所著的《孙子外传》(1646),不仅研究了通行的《孙子兵法》,即日本所谓的《今文孙子》,而且还研究了济美馆樱田迪所藏的《古文孙子》本,并认为此书“盖魏武、李靖之辈不见此本者欤”(《孙子外传·序》)。关于《古文孙子》真伪的辨析,以下将作详解,此不赘述。同时佐藤坚司还认为氏长此书是“日本第一部优秀注释著作”。此外,北条氏长在其名著《土鉴用法》(1646)一书中,将《孙子》的“五事”、“七计”、“诡